

在亚洲打开世界经济动力之门

——写在亚投行开业之际

本报记者 崔文苑

编者按

亚投行今天开业。

亚投行是中国立足自身发展经验的普惠之举。要想富，先修路。——这条标语曾经广泛地写在中国乡村的墙壁上。包括修路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贯穿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中国的建设经验表明，基础设施投资是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石。中国人民体验到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最后一公里”已经成为一个形容词，描述那些最为重要的环节。

如今，中国正慷慨地把自己的建设经验推向亚洲，推向世界——亚投行的借债将不会附带条件。

亚投行的市场前景是广阔的，不存在抢“蛋糕”的问题——据测算，到2020年，亚洲发展中国家每年平均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约7300亿美元，但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在该领域的年度投资规模仅为100亿-200亿美元。

亚投行的风格是国际范，不是处心积虑排他利己的“小家子气”——亚投行旨在动员更多政府和社会资本，支持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为成员国提供投资机会，有利于全球经济复苏。

亚投行开业了，祝贺！



位于北京金融街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办公场所(2015年12月21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李 鑫摄

836天。这是亚投行从提出倡议，到正式开业的时间。

赢得了这场与时间的赛跑，得益于中国及各个创始成员国在沟通与磋商中展示出的“奥林匹克精神”，无论是组织架构还是运营管理都迅速有效达成共识。同时，还得益于各方利益“公约数”最大化带来的“人气”，拥有全球近一半人口的亚洲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打破区域经济增长的“掣肘”，通过推动投资增长，扩大全球总需求，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推动世界经济加快复苏。

在这样的互利共赢局面下，亚投行的起点从来就不是“亚洲俱乐部”，而是包括英、法、德在内的57个成员国的另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多边开发机构。这不仅有助于促进亚洲国家间的经济一体化，也有助于亚洲与包括欧洲在内的其他大陆经济更深入的融合。

“争分夺秒”的成立历程

回顾亚投行成立过程，几乎可以用“争分夺秒”来形容。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与时任印尼总统苏西洛在雅加达举行会谈时提出，为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方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个月之后，筹建亚投行进程在北京启动。在紧随而来的2014年1月、3月、6月、8月、9月召开了5次筹建亚投行的多边磋商会议。

密集会议背后，更多的是激烈的交锋和艰苦的准备工作。在2014年这一确定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关键阶段，作为财政部主管副部长，史耀斌从年初就开始频繁走访相关国家做工作。一位参与亚投行筹建的工作人员回忆说，3月8日马航航班失联事件发生时，正处于与东南亚国家筹建磋商的关键阶段，亟需尽早出访。但如果在计划时间内完成既定走访任务，部分航段仅有马航航班可选，史耀斌和工作人员置风险于度外，毅然搭乘马航航班，连续走访东南亚5国，在最短

间内实现了预期目标。

正是在这样的紧锣密鼓的筹备下，2014年10月24日这天，21个亚投行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在人民大会堂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标志着各方共同决定成立亚投行。仅仅用了一年时间，从一国倡议的星星之火，已成为多国参与形成的“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情形。

随后亚投行筹建转入多边阶段，重点不只是吸收新意向创始成员国，更要加快推进亚投行法律协议的磋商进程。而关系到亚投行运营的根本大法，以及其他重要政策文件，都必须在各国财政部副部长为首的首席谈判代表会上进行。从昆明到孟买，从阿拉木图到北京，从新加坡到比利斯，从法兰克福到雅加达……经过一次次台前激烈交锋、台后斟酌打磨，《亚投行协定》终于在新加坡历经3天艰苦谈判达成一致，为亚投行按时完成筹建、顺利开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5年12月25日，恰逢圣诞节，亚投行在喜庆的气氛中宣告成立。这也成为中国和各个创始成员国送给世界人民的一份“圣诞礼物”。事实上，在这天成立不是“选”出来的，而是由于同时满足至少有10个国家批准、且这些国家初始认缴股份总和占比不少于50%这两个条件，《亚投行协定》正式生效，亚投行法律地位也得以确立。

保障各位成员“当家做主”

亚投行这个大家庭到底“长”什么样？

目前，这个大家庭中共有57位成员，中国、印度、俄罗斯、德国和韩国，为前五大股东。

这么多的家庭成员如何当家做主？这首先就涉及投票权的问题。“亚投行的总投票权包括三部分：股份投票权、基本投票权，以及创始成员享有的创始成员投票权。”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向记者介绍说，股份投票权等于成员国持有的股份数；基本投票权由创始成员和普通成员平均分配；此外，每个创始成员同时拥有

600票创始成员投票权。

按照上述规则测算，在1000亿美元亚投行的法定股本中，中方认缴股本为297.804亿美元，现阶段为亚投行第一大股东，且投票权占总投票权的26.06%，也是现阶段投票权占比最高的国家。史耀斌表示，以后随着新成员的不断加入，中方和其他创始成员的股份和投票权比例均有可能被逐步稀释。

后续成员国吸纳、项目选择、日常事务决策……开业后的亚投行如何运转，也非常令人期待。作为一家国际金融机构，亚投行治理架构由理事会、董事会和管理层组成。由所有成员国代表组成的理事会，是其最高决策机构，参与亚投行的治理和重大事项决策。亚投行成立后，中国财长将担任亚投行中国理事，并指定一名副部长担任副理事。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担任副理事。董事会将在理事会授权下行使决策和监管权力；管理层在董事会指导下开展银行日常业务。

据了解，成立后亚投行将继续吸收新成员。根据《亚投行协定》，新成员加入，需理事和投票权均超过一半才算通过。那么，新成员和创始成员有啥区别？《经济日报》记者了解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创始成员参与筹建，特别是参与《亚投行协定》条款的制定，而新成员需接受既定条件才能加入；二是每个创始成员享有600票创始成员投票权，新成员则没有；三是在理事提名董事并进行投票、董事任命副董事时，创始成员享有优先权，即每个创始成员均有权在其选区内永久担任或轮流担任董事或副董事。除此之外，新成员在参与亚投行治理、重大事项决策等方面与创始成员所享有的权力、责任和义务相同。

融资和盈利是未来重点

成立的速度之快，成员国参与积极性之高，都反映出亚投行极高的“人气”。那么，这“人气”从何而来？换言之，亚投行

能为成员国乃至世界带来什么？

作为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亚投行主要向成员国提供低息贷款，用于亚洲基础设施项目所需资金，比如机场、公路、电信、铁路、城市建设等。而这恰恰是亚洲区域经济发展最需要的支持。

亚洲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拥有全球近一半人口，是当今世界最具经济活力和增长潜力的地区。但因建设资金有限，一些国家铁路、公路、桥梁、港口、机场和通讯建设严重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区域经济发展。据测算，在2010年-2020年期间，亚洲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总需求高达8万亿美元，年平均投资约需7300亿美元，其中68%用于新增基础设施，32%用于维护或维修现有基础设施。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在亚洲基础设施领域的年度投资规模仅为100亿-20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设立亚投行，动员更多资金，支持域内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将为亚洲经济增长注入长久动力。对西方国家而言，亚投行则扩大其对投资品的需求，为疲弱的世界经济注入动力。

亚投行的成立，仅仅是个起点，未来还有更远的路要走。

对于初始注册资本为1000亿美元的亚投行来说，未来要想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丰富的资金，亟需建立合理的融资模式。在运营初期，亚投行将主要向主权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主权贷款，针对不能提供主权信用担保的项目，引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

此外，在史耀斌看来，亚投行未来运营的重点之一是解决好如何盈利的问题。“有三种途径。一是要选择好的项目，既见效快又利于地区经济发展；二是与其他多边开发机构合作，加强项目的有效管理，尽可能让各成员国的意愿都能有效实现；三是完善治理结构，按照公开、透明、合理、有效等原则，和成员国之间达成共识。”史耀斌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新加坡、马来西亚

新马高铁或成首个投资项目

本报驻新加坡记者 刘 威

未来5年马来西亚计划将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交通系统等。在诸多基础设施项目中，横跨新马两国的新马高铁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据有关测算，当前马来西亚国内的融资缺口约占其GDP总额的4%左右。新马两国专家预测，亚投行设立的初衷与新马高铁项目的需求高度契合，将成为亚投行投资的第一个大型项目。

按照项目规划，新马高铁全长约350公里，预计耗资120亿美元。沿途经过巴生河流域、森美兰芙蓉、马六甲以及柔佛等地，时速达350至450公里，可将目前来往新加坡和吉隆坡约6小时的车程缩短至大约90分钟。届时，吉隆坡与新加坡基本上将能实现“一日生活圈”的双城概念。更为重要的是，新马高铁项目一经落成将使得设想多年的泛亚铁路初具雏形，也将极大促进东盟域内的互联互通。

新马高铁的大部分线路都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段仅有不到20公里的距离。新加坡专家认为，新加坡政府预计会独立负担境内的高铁工程费用。而在马来西亚，考虑到国际油价持续走低，由政府直接出资的可能性较低。马来西亚总理署部长阿卜杜勒·瓦希德此前也曾透露，作为油气产品净出口国，油价暴跌给马来西亚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新马高铁项目将采用公私合作模式进行，政府只负责部分项目费用，剩下的由私人部门承担。因此，侧重于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是马来西亚为新马高铁项目进行融资的最佳选择。

韩国

中韩列车渡轮等工程有望入围

本报驻首尔记者 杨 明

韩国作为亚投行第五大股东，非常期待亚投行能给本国企业带来更多的海外发展机会。据韩国政府智囊部门预测，韩国首先可以参与的项目包括：东北亚高速铁路网示范工程、开设中韩间列车渡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活环境改善项目、设立中韩自贸协定域外加工区等。

据普华永道预测，到2025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将达到9万亿美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市场规模未来10年将以年均7%至8%的速度成长，到2025年占到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市场的60%，规模达到5.3万亿美元。亚投行将为韩国打开这一巨大市场的大门。

有关专家认为，韩国在海外建设工程领域具有世界竞争力，在日本没有参与亚投行的情况下，韩国建筑企业获得相关订单的可能性大增，亚投行的正式启动将带给这些企业难得的发展契机。

韩国海外建筑企业从1965年开始正式走出国门，过去50年间完成协议额达到7000亿美元，成为韩国经济发展中重要的外汇来源。但由于近两年低油价长期化和世界经济动力不足，韩国海外建筑行业利润由2013年的1.9%跌至2014年的0.9%，2015年则进一步滑向谷底。韩国建筑公司的海外项目多集中在中东市场，低油价导致的需求下滑令韩国海外建筑企业业绩惨淡。而亚投行带来的潜在业绩增长预期对这些韩国企业来说可谓一场“及时雨”。

德国

确保项目建设符合环保高标准

本报驻柏林记者 王志远

德国是亚投行域外创始成员国中最大的出资国。德国财政部一份文件显示，德国计划在2016年至2019年向亚投行提供约9亿美元资金，自2016年起提供36亿美元担保。德国政府希望通过多边金融机构支持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并确保这些建设项目符合有关环境保护和社会福利的高标准。亚投行的德国执行董事将常驻北京。

德国舆论认为，中国早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也期望其经济权重在国际秩序上有所反映，例如国际金融秩序。中国牵头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正是国际金融秩序改革的重要步骤。目前的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组织结构“硬化”，拓展无门。例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多次受阻。在现有国际机构和组织中，中国必须得到充分尊重。

“亚洲毫无疑问需要其他的融资机构。为了优化亚洲的基础设施项目，预计在2020年前需要超过8万亿美元的融资。亚投行可以作出极具价值的贡献，为成员国提供初始资金，并为急需投资的私营部门或公共账户注资。”德国《南德意志报》的一篇报道里这样写道。亚投行许诺未来将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毕竟中国从自身的经验中，可以知道发展中国家的痛点所在，以及如何应对。此外，与世界银行等机构的习惯做法不同，亚投行的借债将不会附带条件，例如必须将国有产业私有化或实施市场自由化。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施蒂格利茨在德国《商报》撰文称，在世界援助资金多变的今天，做出新的尝试有助于为全球发展作出显著贡献。基础设施政策对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特殊利益的影响，与其他政策领域方面的影响相比要小得多。因此他认为反对者的担忧是不必要的。此外，施蒂格利茨强调，基础设施投资有保障生态经济、环境方面的需求，将其置于一个多边框架环境下投资会更有效。

本版编辑 刘 亮

国际金融秩序改革的重要一步

——中国银行巴黎分行总经理潘诺谈亚投行开业

本报驻巴黎记者 陈 博

示愿意参与相关计划的国家之一，这充分体现了法国助力亚投行筹建的诚意。

潘诺认为，法国积极参与亚投行计划，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近年来中法政治互信程度不断加深，两国高层领导人互访频繁，这为两国经贸与金融合作交流创造了极好的氛围和先决条件。其次，法国经济自欧债危机以来始终处于疲软状态，由于其国内市场体量有限，仅仅依靠拉动内需不足以完全满足其振兴经济的要求。正是由于看好中国经济具备广阔前景，法国政府不仅积极参与亚投行筹备建设过程，还乐见本国企业能够在未来更多地参与亚洲经贸活动，助力本国经济增长。第三，在美国政府宣布对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施以天价处罚后，法国政府及金融业对美元全球霸权的反对呼声日渐高涨。

在此背景下，法国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的务实合作态度：除巴黎积极申请人民币离岸市场地位外，中国银行更是在去年以联席主承销商之一的身份，协助法国社会保障债务管理基金(CADES)发行了30亿元的离岸人民币债券，由于广受投资者欢迎，该债务计划实现了超额认购。

早在数年前，时任法国总理的拉法兰便向潘诺感慨：“若是能将两国的资金、技术、品牌效应等优势有机结合，中法在全球市场上想要实现双赢甚至多赢的局面并不难”。目前，法国金融界对亚投行开业投以高度关注，多家当地大型银行的行长也表达了共同参与亚投行债券发行的意愿，同时数个法国大型跨国企业也多次申明参与了亚洲沿线基础设施建设的强烈意向，亚投行的开业无疑将对未来中法经贸与金融合作交流产生积极效应。

专家访谈

中国银行巴黎分行总经理、法国法学国家博士潘诺(Phan Nhay)近日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法国业界对即将开业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报以热烈期待，法国愿积极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潘诺认为，亚投行的建立有望进一步深化中法两国在经贸与金融领域的交流。

潘诺表示，法国在过去几十年内参与全球多边金融治理的经验非常丰富，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几任总裁也多为法国籍，因此“金融嗅觉”敏感的法国人始终对亚投行计划给予较高关注。在中国政府宣布亚投行的筹建声明之后，法国是欧元区区内最早表